上海文学通史上册目录

绪论 …… 员

第一编摇上海古代文学史

第一章摇上海地区的早期文学…… 员愁
摇第一节摇上海古代文学的源头——上海远古文化…… 员愁
摇第二节摇陆机、陆云、陆氏家族与上海早期文学…… 圆圆
摇第三节摇唐代的上海文学…… 猿远
摇第四节摇宋元时期上海文学的渐兴…… 源员
摇第五节摇赵孟頫、杨维桢及其他作家 …… 源苑
第二章摇明代前期与中期上海文学…… 远源
摇第一节摇文化环境的变迁与上海古代文学进入繁盛期…… 远源
摇第二节摇学者陶宗仪及其文学成就…… 苑员
摇第三节摇诗人袁凯、管讷与王彝 …… 苑愿
摇第四节摇陆深…… 愿缘
摇第五节摇何良俊与陆树声…… 怨猿
第三章摇明代后期上海文学 …… 员园源
摇第一节摇文化环境与文学潮流 …… 员园源
摇第二节摇宋懋澄与松郡四大家 …… 员员员
摇第三节摇小品家陈继儒及董其昌、张鼐等…… 员园猿
摇第四节摇李流芳与“嘉定四先生” …… 员猿远
摇第五节摇陈子龙与夏完淳 …… 员缘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摇清代的上海文学 …… 员怨
摇第一节摇群龙无首,遗风犹存 …… 员怨
摇第二节摇云间诗派 …… 员员
摇第三节摇云间词派 …… 员怨
摇第四节摇学者型诗人的崛起 …… 员愿
摇第五节摇学者型散文家 …… 圆源

第二编摇上海近代文学史

第五章摇开埠前后的上海文学 …… 圆员
摇第一节摇龚自珍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准备 …… 圆员
摇第二节摇近代都市的形成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新变 …… 圆员
摇第三节摇全国文化与文学中心的形成 …… 圆源
摇第四节摇市民心理的转变 …… 圆愿
摇第五节摇主要文学思潮和文学发展阶段 …… 圆苑
第六章摇渐变期的上海文学 …… 猿怨
摇第一节摇王韬与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再兴 …… 猿怨
摇第二节摇文学观念由渐变趋于质变 …… 猿缘
摇第三节摇刘熙载、姚燮与渐变期的诗文 …… 猿缘
摇第四节摇韩邦庆与渐变期的海上小说 …… 猿圆
第七章摇文学救国与三界革命 …… 猿员
摇第一节摇社会环境、士大夫心态的巨变与文学救国热潮的
兴起 …… 猿员
摇第二节摇梁启超与诗界、文界的“革命” …… 猿缘
摇第三节摇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小说的繁荣 …… 猿怨
摇第四节摇政治小说的崛起与作用 …… 猿怨
摇第五节摇民初政治小说退潮与作家的抗争 …… 猿愿
第八章摇西方文学的介绍与文学观的变革 …… 猿源
摇第一节摇西方传教士创办报刊与早期的文学翻译 …… 猿源
摇第二节摇严复、林纾与晚清的翻译 …… 源远

摇第三节摇吴趼人与短篇小说的崛起 …… 源园
摇第四节摇西方影响与早期话剧运动 …… 源愿
第九章摇复古主义文学思潮 …… 源苑
摇第一节摇复古思潮和章太炎、刘师培的文学观…… 源苑
摇第二节摇陈衍、沈曾植等人的文学观与创作…… 源缘
摇第三节摇柳亚子和南社的创作 …… 源缘
摇第四节摇朱孝臧、况周颐和词坛的复古…… 源愿
第十章摇文学的俗化运动 …… 源怨
摇第一节摇俗文学的崛起与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变革 …… 源怨
摇第二节摇传媒与文学 …… 源缘
摇第三节摇谴责小说与小说艺术的新变 …… 缘园
摇第四节摇民初小说的理论与创作特点 …… 缘源
摇第五节摇旧剧改革与戏剧走向民间 …… 缘源
第十一章摇曲折发展的人文需求 …… 缘源
摇第一节摇人文需求的初步觉醒 …… 缘源
摇第二节摇人文精神的发展 …… 缘愿
摇第三节摇王国维与新型文学观念的确立 …… 缘缘
摇第四节摇传统礼教的改良与人文精神的缺陷 …… 缘缘

绪摇摇论

上海是个海。二千年前，当三晋、齐鲁、秦楚文化已日臻繁荣，而现上海中心市区却仍在滔滔大海中沉浮。七百年前，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先后统领中国文坛之际，上海才刚刚置县，上海地区还是个初开垦的文学滩涂。可是峰回路转，风云变幻，到了近现代，上海却突然两度飙升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真是“沧海桑田”啊！可是上海这个“沧海”又何止变成“桑田”？近代以来，上海依然是个“海”，不过已由茫茫沧海演变为经济繁荣之海，文化昌盛之海，精英荟萃之海，文学激流汹涌之海！人们早就在思索：上海文学剧变的渊源何在？轨迹如何？它有哪些特征？它在中国文学中处于何种地位？它的剧变给予我们什么启示？这些正是我们撰写这部通史所要追索的问题。

一

上海文学的发展同上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尤其是上海城市地位的历史变迁几乎是同步的，走过了一条由全国文学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以至成为全国文学中心、中外文学交流中心的曲折长路。如果对这条长路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它大致经历了古代的发轫期，近代的兴盛期，现代的高潮期和当代的更新期。

文学发展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更以经济形态的变更为动力，上海近代、现代和新时期文学的突飞猛进就是以新经济为拉力的。但是文学发展并不以经济为唯一要素，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地域、人口和

文学自身的承传、创新、文学精英的汇聚以及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发展同经济发展并非都是平衡的。早在五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上海地区便已形成以农业、渔牧业、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此后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吴越文化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并不比中原地区落后。但是在那杳渺的先秦时代，由于上海地处海隅，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带，所以在这里很难寻觅到文学的踪影。这里或许曾经散落过闪光的文学贝壳，却终究没有发现像《诗经》、楚辞那样的明珠，甚至连那想必流传过的民谣、传说也被冲积的泥沙和历史的尘埃湮没了！两汉以后，上海地区的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民风也由先秦的“好武”渐变为“尚文”，直到出现了文化积累深厚的世家大族，上海文学才开始崭露头角。萧统编选《昭明文选》时曾选录了华亭人陆机、陆云的诗赋文章三十一篇，“云间二陆”就成了上海文学史上第一对灿烂的双子星座。可惜这仅是昙花一现。从隋唐到宋元，上海所属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已高于北方，但是后发的农业经济却无力引发上海文学的质变。这一时期上海只出过一些三四流的作家，倒是外地著名作家如唐诗人皮日休，宋诗人梅尧臣、王安石，元诗人赵孟頫、杨维桢等人曾到上海地区寓居、游历，给上海文学平添了几分亮色，但终究没有形成堪与中原文学媲美的大气候。

到了明代，上海古代文学曾出现了第一次繁华景象。这首先得力于商品经济这一新经济形式的刺激以及与此伴随的内外航运的发达，而市镇、人口的骤增，文化教育事业的兴旺，更为上海文学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也为文学造就了士人、市民阅读大众。有明一代，上海地区第一次涌现出一大批本籍文人，袁凯、陆深、何良俊、宋懋澄、陈继儒、李流芳、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和科学家徐光启、书画家董其昌等，都在全国享有盛誉。同时，政治风云也为明代上海文学的发达提供了契机。宋元以来，北方战乱频仍，而上海远离战火，又山青水秀、稻香鱼肥，成了文人学士理想的隐居避难之所，明代著名作家陶宗仪、高启、唐顺之等都曾寓居上海。这些新移民的到来既繁荣了上海文学的创作和评论，更带来了中原文化、江浙文化的新声，使上海文学同外地文学开始逐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融为一体。这是上海地区为中国古代文学奉献著名作家最多的时代,也是文学思潮最活跃的时期,明代文坛盛行的“经世致用”论与“独抒性灵”论之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摹古论与重“天真”、“本色”的创新论之争,“师心”与“师天地”之争以及雅俗之争等等,在上海都有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些本籍作家与外来作家的汇聚,文艺思潮与文学创作的齐头并进,共同构筑了明代上海文坛的盛况,使上海文学由中国古代文学的边缘开始迈开了走向中心的步伐。但是到了清代早中期,由于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和一度实施海禁,阻塞了对外文化交流,禁锢了文人学士的思想言路,文学上的个性思潮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均日趋萎靡,经学、宋明理学占了上风,而考据学在上海的盛极一时则是这种风气转变的直接反映。其时上海的“云间诗派”、“云间词派”虽曾活跃一时,并曾奉献出王鸿绪、钱大昕、王鸣盛、陆锡熊、王昶等闻名全国的训诂学家、编纂大家和“学者型诗人”,但文学创作尤其是文学理论批评毕竟要逊于明代。

如果说上海古代文学是上海文学的发轫,是隶属于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地域性文学,只能算是“上海的文学”,那么当上海正式开埠以后,上海文学便跨入了它的新时代,进入了它的兴盛期,其性质、特征、地位都发生了剧变:由以农业乡镇文学为主体的文学演进为初具工商业城市特色的近代型文学;由封闭半封闭的“上海的文学”突变为内向辐辏、外向辐射、多元复合、锐意创新、引领潮流的“上海文学”;由全国文学的边缘飙升为无与伦比的全国文学中心。这种剧变是上海城市经济的猛进和近代大都市的确立、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市民社会的孕育、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多种社会力量的角逐、对本土文化的张扬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社会观念的嬗变和文化思潮的更新这五大新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它的直接催生剂则是文学观念的裂变、文学运动的交替、文学精英的汇聚、文学受众的扩大和文学运行机制的革新、文学出版业的发达、文学市场的发育。

近代的上海是集工业、金融、贸易为一体的全国经济中心,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人口最多的特大城市。与此相应,上海的文人

学者也呈几何级数增长，初具近代意识的文学精英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些都为上海文学的突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人才资源和人文环境，而市民社会的孕育、文学市场的兴盛和大众阅读心态的变易，又为文学提供了广大的读者群。上海并非全国政治中心，但这里有全国设立最早、面积最大的租界。这种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租界所产生的“缝隙效应”，在客观上为各种政治派别、新潮人物提供了张扬自己和相互角逐的自由空间，实际上这里已成为除北京之外的准政治中心或主要政治论坛。前有改良主义的先驱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在这里发轫，后有改良主义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这里宣传变法，倡导文化“变逆”、“道器俱变”、“三界革命”，从而将中国改良主义文学推向了高潮。接着又有民主主义的先驱陈去病、柳亚子、高旭、苏曼殊、章太炎等人在这里结社、兴学、办报，提出了民族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并和同光体等复古思潮展开了论战。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美学的终结者刘熙载、况周颐，初步将中西美学加以融合的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也在这里著书立说，对上海文学乃至全国文学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是文学价值观、本质论、功能论、文体论、风格论变革最剧烈的年代，文学已开始逐步世俗化、市民化，由传统的载道工具演变为宣传社会变革和休闲娱乐的手段，历来的“经世致用”观被赋予了启迪民智、改良群治的内蕴，文学的作者已由士大夫文人逐步转化为初具近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文学的对象已由以往的士大夫开始转向市民大众和面向市场，文学样式、范畴已由诗文的一统天下演化为小说、戏剧的登堂入室和报章文体等新文体的诞生，文学风格也由“中和”、“温柔敦厚”转向个性的张扬、自我的表现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文学语言则由言文分离开始转向言文统一……这一切都是率先在上海兴起，然后逐步推向全国的。

经济、政治、文化的新格局，文学观念的新变和人才的集聚，必然导致文学创作、评论、翻译、出版的繁荣和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上海率先打开了门户，成为西学输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上海输入的西书和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均占全国之首，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翻译机构、中文杂

志、中文报纸、文学期刊,近代最早最具影响的文学社团海上文社、南社和新剧团体春阳社、春柳社等等都率先诞生或主要活动于上海,堪称中国近代小说代表作的四大谴责小说《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而风行一时的“政治小说”和多如牛毛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则更是上海的特产。文学报刊出版业的发达和文学市场的兴旺,还催生了报刊出版的独立经营机制和稿酬制的建立,滋养了大批以写作、编辑为生的职业作家,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他们有可能逐步摆脱外力的掣肘,张扬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这一切都表明上海近代文学的繁荣兴盛乃是时势使然,同时也表明到清末民初,上海实际上已在无形中成为当时全国文学的中心。

“五四”以后,上海文学又一次发生了质变,迈进了它的高潮期和产生巨人巨著的时代。这种新变的现实基础当然首推上海城市领先于全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都市文化的发育。此时的上海不仅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国际大都会,成为全国集工业、贸易、金融、交通、电讯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成为全国现代形态的文化中心和现代型文化产业、精英知识分子、工人大众、市民社会的集中地,而且成为新兴社会力量、新质社会革命、现代文学观念剧变的发源地和各种政治势力、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相互较量的前哨。外国势力、军阀势力、国民党政权都在这里构筑它们的文化堡垒;各种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者也在这里掀起他们的文学运动;而这里又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枢纽,现代文学革命、革命文学的大本营。这一切都为上海文学的腾飞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构成了上海文学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多元复合的发展态势,终于在二三十年代又再度成为全国文学中心。即使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文学虽然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但也依然激荡着这种强势的余波。

上海现代文学作为全国文学中心的主要标志,可概括为五个中心的确立和五大功能的发挥。

一、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中心,起着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导向作用。五四以后,中国文学观念所发生的新的质变和裂变,大多滥觞于上

海。一方面，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起和深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民主主义文学在上海现代文学中占了主导地位，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呼声，[illegible]年代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革命文学”思潮，[illegible]年代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孤岛文学，解放战争时期的反独裁、反内战文学，以及它们所激起的重大论争和创作实践，都是首先在上海发起，都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西方文学的输入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市民社会的成形，使自由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和都市文学、市民通俗文学乃至“民族主义文学”、汉奸文学，也纷纷以上海作为他们的主要阵地。这些在上海形成和相互角逐的文学思潮、流派，对全国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变异都起了正负两方面的导向作用。

二、中外文学交流中心，起着内向辐辏外向辐射的聚散作用。这种地位、作用在近代便已初具规模，到现代更为显著，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西方文学思潮，还是外国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方法、形式、技巧、流派，大多先在上海传播、借鉴、移植、运用，再传往外地乃至全国。上海成了中外文学的交汇点，学习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形式、手法的大学校，发挥了中外文学交流的枢纽功能和动力泵作用。

三、文学人才中心，起着文学精英的聚合作用。上海从未“引进”过作家，但是上海的文学生态环境是个巨大的磁场，无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丁玲等左翼作家，巴金、叶圣陶等民主主义作家，还是徐志摩、林语堂等自由主义作家，李金发、戴望舒等现代主义作家，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张爱玲等都市文学作家，以及陈独秀、周扬等文学理论家，朱生豪、傅雷等文学翻译家，这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流作家、重要作家大多集中在上海。尽管他们的政治态度、文学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在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民主自由上找到了契合点，遂至求同存异，一致抗敌，掀起了浩浩荡荡的新文学运动，以至各种倒退的文学力量无法和他们抗衡。他们来自各地，抗战爆发后又分赴各地，成为各地的文学骨干。

四、文学社团、流派、报刊、出版中心，起着文学运行机制变革的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范作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要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朝花社、南国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等,主要文学流派如为人生而艺术派、自我表现派、浪漫派、新月派、论语派、现代派、唯美派、九叶派、新鸳鸯蝴蝶派等等,主要文学报刊、出版机构和书店,如《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月刊》、《语丝》、《新月》和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等,几乎都集中在上海,而且这些社团、流派往往同报刊、出版、书店融为一体,使上海成为全国文学书刊的出版基本和中心市场。其时,全国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大多在上海首发和率先上市,即使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文学社团、报刊、书市也依然持续强劲的势头。文学社团、流派、报刊、出版、书市大量集中于上海以及它们的相互竞争、相互吸纳,不仅导致了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和文学理论的新建构,而且推动了文学的市场化和文学运行机制的进一步现代化,成为全国的典范。

五、文学消费中心,起着文学批评鉴赏的定向作用。上海现代文学绝非“亭子间”文学,它是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的。这里不仅有最强大的作家阵容和最繁盛的文学市场,而且有最强大的评论队伍和有较高鉴赏力的阅读大众。各种文学作品乃至各门类的艺术作品往往先在上海“一朝鲜”,然后才“走遍天”。正因为上海成了文学出版传播消费中心,上海文学批评鉴赏无形中起到了定向定位作用,所以许多并未在上海长期寓居的重要作家如老舍、曹禺、沈从文、钱锺书等也选择在上海首发他们的主要作品,然后再传播到各地。

上海现代文学不仅创造了上海文学史上的辉煌时期,而且也标志着当时全国文学的巅峰。按照人们的想象和愿望,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文学按理应当进入它的更加辉煌的更新期。可是这种“更新”却是如此的艰难和坎坷!建国初的十七年,上海文学在描写革命战争和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吴强、峻青、茹志鹃、周而复等人的小说,巴金、傅雷等人的散文,夏衍、杜宣等人的电影戏剧文学,陈伯吹等人的儿童文学,胡风、王元化、钱谷融、蒋孔阳等人的文艺理论批评,都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束缚,市

民社会的解体，对外交流的中断，户籍制度的严控，文化中心的北移，文学精英的流失，文学运行机制的僵滞，文化市场的萎缩，尤其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严酷的思想清算，文学观念的大一统，造成了文学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单一化和社团、流派的消解，有的甚至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这十七年中，上海的城市地位变了，由原先的国际大都会复降为闭塞的国内城市，上海文学也不得不由外向复归内向，由多元归于一统，由全国文学中心复降为半封闭的地域性文学。到了“文革”十年，上海更成了极左思潮的发源地，阴谋文艺的制造厂，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上海文学曾经有过的辉煌已经荡然无存了！

灵魂振 新时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日益深化，上海又重新向集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人才中心为一体的国际大都会迈进，并且成了经济腾飞的典范，对外文化交流的门户，上海文学也终于开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更新。这种更新既表现为作家队伍的重新整合和不断壮大，文学观念的深层次变革，文学流派的竞相迭出，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又表现为文学运行机制的初步革新，文学报刊出版和文学市场的重振雄风，大众阅读心态的变易，逐步形成了以弘扬时代精神为旨归、以教育为职责的“主旋律”文学，以倡导人文精神为宗旨、以探索为特色的精英文学和以市场为转移、以娱乐休闲为主要职能的通俗文学三者相对独立而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多维格局。新时期以来的上海文学虽然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有的作家还显得有些浮躁，而中外文化资源精粹的积累也稍歉虚弱，文学巨人、巨著还不多，遂使上海文学未能也难以恢复昔日全国文学中心的地位，但它作为全国文学重镇却是毫无疑义的，并且正在逐步发展为国内外文化、文学交流中心之一，在中国跨世纪的文学中正放射出它的特异的光彩。

二

有文献记载的上海文学已经走过了一千七百多年崎岖曲折的历程，尤其是经过开埠以来一个半世纪的腾飞，逐步形成了它所独具的鲜明特

色,并为新世纪文学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开放、兼容、多元的发展态势

封闭、一统是文学发展的牢笼,开放、多元是文学发展的契机。回顾历史,上海曾有三次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第一次是唐宋以前自然经济和地处海隅所造成的闭塞,使上海文学自生自灭,长期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地带;第二次是清王朝闭关锁国和思想钳制,酿成了文学观念的呆滞和文学创作的萎缩;第三次是建国初期和"文革"十年国内外严酷的政治气候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封闭,使上海由全国文学中心重新降为地域性文学。上海又有过三次开放,第一次是宋元以后上海远离战火、商品经济初兴所造成的自然开放,为上海明代文学开始走出边缘、迈向中心提供了契机;第二次是上海开埠以后直至建国前的被动开放,客观上为上海文学的腾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使上海文学两度跃升为全国文学中心;第三次是新时期的主动开放,使上海文学又重新焕发起勃勃生机。对外开放的直接结果之一是使上海快步城市化,成了举足轻重的国内或国际大都会、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和全国最大最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和都市化对文学发展的最直接的影响,一是建构了基于新型都市经济的都市文化,滋润了都市人的生态、心态和与都市文明相适应的价值取向,为上海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都市生活的沃土和适宜的文化氛围;二是人口剧增、文化精英汇聚、市民大众文化需求多种多样,使上海文学的创作主体文化底蕴深厚,视野宽广,有较强的创造力,表现主体涵盖社会各阶层,生态、心态层出不穷,变化万端,接受主体有较高的鉴赏力;三是随着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四方八处各种文化的传播、移植,使同根同种、同根不同种的国内文化和既不同根又不同种的外国文化都在上海汇聚,使上海文学呈现出多元复合、多元互补的发展态势;四是养成了市民较少排他性较多兼容性的宽广胸怀,无论是外地的、外国的、新颖的、传统的,都能兼收并蓄,让各种文学在这里交流、碰撞、竞赛和融合。正因为如此,所以上海文学成了从岭南到燕北,从高原到海滨各地文学

的聚集点，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汇合地，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与市民通俗文学的集合体。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上海文学的写照。

上海的都市化，上海文学的多源、多元及其互容互溶互补，蒸发了上海文学的原创性和弥散性。这种特点在明代已初显端倪，到近现代更为自觉和显著，各种应运而生的新的文学观念、思潮、社团、流派、报刊往往先在上海发端、成形，然后再传往各地；各种新的思想倾向、审美取向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先肇始于上海，然后又扩散到外地；在文学形式、手法、风格上，无论是现实的浪漫的，传统的新锐的，高雅的通俗的，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读者群，然后又得到各地的认同。上海文学的这种多元复合、多元互补，已成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近现代文学日趋多样的一种预兆和象征。当然，开放、兼容、多元，难免显得庞杂、芜杂、鱼龙混杂，但是“杂”正是移民城市和大都会所必有的特色，也是上海文学的显著特色和优势之一。历史已反复证明，多源、多元、多样、寓杂多于统一，才有活力，才有发展，才有主调，才有精华，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单源、单一、一统，势必“声一无听，物一无文”，除了单调、单薄和僵滞外，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二、敏感、进取、趋时的文化心态

上海人素以敏感、敏捷著称，上海文学更是社会生活、经济形态每一次重大变革的感应神经。在那自然经济时代，上海文学是以农业文化或江南稻作文化为底蕴的文学，曾对社会的不公和弊端作出敏感的反应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但终究尚未形成鲜明的优势。当上海率先进入工商业城市，呈现出近现代的都市文明，上海文学便在全国文学中率先崭露出近代型、现代型都市文学、市民文学的特色，像《子夜》那样的反映工商业都市生活的文学、表现现代都市光怪陆离现象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形形色色市民通俗文学以及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文学市场的兴盛等等，都率先在上海出现是不足为怪的；而当上海率先同经济全球一体化接轨并

进入信息时代，上海文学也随之进一步走向更高层次的国际化、都市化、信息化、市场化。上海文学这种与时俱进，每每领风气之先的品格，既体现了它的敏感性、敏捷性，也表现了它的不断变革、不断突进的进取心。

与此同时，上海文学对政治风云、社会思潮的感应也像风雨表那样敏感、敏捷。在古代，上海虽处中央政治的边缘，但上海文学如陶宗仪、宋懋澄、陈子龙等人的忧时愤世之作都对社会动荡、政事腐败、民族危亡作出了敏锐而强烈的反应，而明清之际隐逸文学、训诂之风的盛行则是上海文学面对政治高压的一种曲折的对应物。开埠以后，上海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上海文学也随之成了中国文学界各种色彩“改良”、“革命”的发祥地。晚清改良派发起的“改良群治”、“文学救国”、“三界革命”以及与之伴随的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的风行，“南社”发出的民主革命的呼声及其反清爱国的政治诗，“五四”时期高举的“文学革命”大旗，[illegible]年代倡导的“革命文学”，[illegible]年代蜂起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孤岛文学……都是首先滥觞和形成于上海。可以说反侵略、要独立，反独裁、要民主，反专制、要自由，反倒退、要进步，一直是支撑上海文学的一根砍不断、扭不曲的主轴。

敏感、进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趋时。如同一块铜板有正反两面一样，上海文学的趋时也有它的两面性。其正面是与时俱进、除旧布新、领风气之先，牢牢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体现着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以至使那些“藏之名山，传于后人”的名士风和钻进象牙塔孤芳自赏的绅士派在上海很难有立足之地。其负面是将趋时蜕变为趋势和赶时髦，或随风使舵，随波逐流，或迎合市民低级趣味，养成了一些政治上的变色龙和惟利是图的无聊文人。古代的应制诗，五四时期复古声浪中的反新文化的“英雄”，[illegible]年代依附于国民党政权和日寇的“民族主义文学”、汉奸文学，“文革”时期为虎作伥的文痞，以及张资平之类的低俗文学作家，都曾在上海发迹，就绝不是偶然的。

三、求变、求新、求奇的创造精神

上海人对古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似乎特别心仪情钟，无论

是衣饰器用还是观念习俗，都常引领潮流而令外地人望尘莫及。有个民谚说："外地人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得三分像，上海早又变了样。"上海文学也素以敢于怀疑、勇于变逆、善于创新著称。每当文学呈现衰败之象时，上海便有人奋起呼吁新变。这种新变，一是变革时弊。在魏晋时期，文坛模拟之风盛行，陆机就提出"放言遣辞，良多变矣"，主张独抒胸臆，超越前人，"虽枨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元明之际，文坛拟古之风又盛，杨维桢、袁凯、陈继儒等人便力主"人各有性情，则人各有诗"，倡导文贵独创、诗贵本色，开了上海明代文学的新风气。二是拓新传统、变逆正宗。当儒家的"道统"、"文统"、"义法"给文学发展带来无形桎梏时，龚自珍、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便大胆提出"变逆"论，主张"法无不变"、"逆则生，顺则夭"、"举叛旗"而"别树一帜"，开了近现代文学变革的先河。"五四"以后，陈独秀、鲁迅、茅盾等人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力主推倒陈腐的旧文学，建设为人生的新文学，并且身体力行，使文学内容形式都发生了质变。三是从外来文学中寻求变革的利器。康有为最早提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人则将西方先进文学与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相结合，开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代新风。观念变革是文学创新的先导，而创新又是变革的依托和归宿，上海文学正是以观念上的开创性，理论上的原创性和创作方法、形式、手法、风格上的创新而起表率作用的。上海近现代和当代的为人生的文学，自我表现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感觉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新观念、新思潮、新方法、新流派，大多率先在上海发起，都市文学、市民文学、儿童文学、留学生文学和白话文、自由诗、新小说、报章体、报告文学、文明戏、现代剧、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等新文体，也大多率先在上海试验、流行。博采众长、逾规越矩、锐意创新、标新立异、出奇制胜、不拘一格、不落一格、丰富多样，就成了上海文学的鲜明特色，也是"海派文化"的特色之一。当然，上海文学的求变、求新、求奇，也有它的负面效应。有时变则变矣，却又变而未"通"，浮躁浅薄 新则新矣，却又赶时髦，惟新是鹜，新而无根，乃至猎奇逐怪，奇而失正。这是上海文

学曾有的弊端,也是“海派文化”曾有的积习。

四、人生、人情、人文的精神追求

文学是人学,是人生的感悟,人情的流露,人格的展现,人文精神的载体。上海文学一直为使人成为文学的主体,表现社会人生,展示人的性情、价值、理想,体现人文精神,提高人格素质而奋斗不懈。晋代陆机首倡“缘情”说,把文学性质特征功能由先秦两汉的言志载道转而为个体人情、人格和人生理想的表现,成为中国文学开始进入“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明代袁凯、陈继儒、李流芳等人倡导文学展示人生、直抒胸臆,尊重创作个性,人格文格统一,从而感发人的意志,同袁宏道的“性灵”说遥相呼应,这些都成了上海文学中弘扬人文精神的先声。到了近代,龚自珍、王韬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尊情”说,力主张扬“自我”,“诗与人为一”,“我手写我口”、表现“我之性情”和独立人格。梁启超更主张美是人生的一大要素,文学艺术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和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要求通过“薰、浸、刺、提”的作用,使人的精神获得自由。王国维还提出文学要“以描写人生为事”,视表现人的真情感为有“境界”,通过“使人之情感发达”的美育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到现代,鲁迅等人和文学研究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和“正视人生”、“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以及“立人”、“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功能论,把人、人生、人情、人格作为文学的主体,把张扬人文精神作为文学的圭臬。建国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和假大空成风的氛围中,钱谷融大胆重申和论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蒋孔阳论证了以人为核心的文学艺术特征论,巴金发出了“说真话”的呼吁,都有石破天惊的震撼力。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艺术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人文精神曾一度濒临失落的危机,又是上海几位青年评论家率先发起了重振人文精神的讨论,唤起了全国文化界的共鸣。这一切都表明上海文学愈来愈自觉地以人为中心,把表现人生、人情、人文精神作为文学的终极关怀,为文学本体性、主体性的实现和回归而努力不懈。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

精神追求和诗情守望，当这种追求同上海文学开放、兼容、多元的发展态势，敏感、进取的文化心态，求新、求变的创造精神交融在一起，便构成了上海文学的独特品格，显示了它的无尽生命力和提升人性、人生的精神力量，并且鲜明地体现了以人为本、海纳百川、开拓创新的上海城市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

三

面对着上海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和鲜明特色，很自然地引起了我们对本书结构、体例的思考。我们把这本书称做《上海文学通史》，这里所说的“通”，主要有下列几层意思。

一、纵向贯通上海古今文学，展示其由中国文学的边缘逐步走向中心、成为中心的历程和脉络。上海文学的发展进程同上海城市史以及中国社会史、文学史的轨迹是基本相通的，所以本书的历史分期仍按通例分为上海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四个时期，并分列为四编，而在各个时期又按史实分列若干阶段。由于上海市在不同时期辖境不同，本书所论述的上海文学通史既包罗了原属吴越、江浙地区现属上海市所辖的乡、镇、县、区的文学，又以现体制下的上海文学为基础而上溯现属上海市辖境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即《上海文学通史》是通论上海地区古今文学的“通史”。其中，上海古代、当代文学史完全是新发掘、新梳理的；上海近代、现代文学史以前虽曾有过由本书作者主编的专著，但本书已由原主编作了新的发掘，新的阐述。

二、横向联通上海文学与外地文学，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联及中外文学在上海文学中的交汇融合。既通述上海文学多源、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又通论上海这个最典型的移民城市里中外文学、古今文学、城乡文学、雅俗文学交汇点的特色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内向沟通上海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相互生成、经纬互动的机制。上海文学观念、思潮的变革常是中国文学观念、思潮变易的先声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